

徐坊和他的“归朴堂”藏书

沙嘉孙

徐坊是我国清末民初时的著名藏书家，他的“归朴堂”藏书虽然比不上晚清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、聊城杨氏海源阁、归安陆氏皕宋楼、钱塘丁氏八千卷楼，但仍然有它一定的地位。缪荃孙在《艺风藏书记·藏书缘起》中说：“通籍后供职十六年，搜罗群籍，考订版片，迺时谈收藏者：潘吴县师，翁常熟师，张南皮师，文治庵丈，汪郎亭前辈，蔡松夫、黄再同两同年，盛伯羲、王廉生两祭酒，周芸生编修，王芾卿、徐梧生两户部，陆纯伯中翰，互出所藏，以相考订。”缪荃孙所说的徐梧生，就是徐坊。傅增湘在《双鉴楼善本书目·序》中也说：“历观近代胜流，若盛意园、端甸斋、徐梧生诸公，当其盛时，家富万签，声名烜赫，駉駉与南瞿北杨齐驱方驾；而鼎革未几，楹书咸佚，求其家藏簿籍，渺不可得，未尝不叹风流之易歇。”缪荃孙把他跟潘氏滂喜斋、盛氏意园等相提并论，傅增湘甚至说他与“南瞿北杨齐驱方驾”。可见徐坊是近代藏书史上的佼佼者。但是，对于这样一位重要的藏书家，国内图书馆界同人，包括一些著名的目录版本学家，对他还不是很熟悉的。如王重民先生在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中说：“徐坊一印，在余为初见，殆近人徐梧生欤？”尽管这个猜测并没有错，但王先生毕竟不确切了解徐坊就是徐梧生。

徐坊之所以不为人知，正如傅增湘先生所说：“监丞（案：指徐坊）藏书夙富，然严扃深轴，秘不示人，同时嗜书如缪艺

风，穷经如柯凤孙，与监丞号为石交，亦未得寓目。”^①这就无怪徐坊死后，柯劭忞为他所撰墓志铭中只字未提及他的藏书了。由于资料奇缺，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不少困难。在这里，我只能用许多零星的材料，将徐坊的生平和藏书情况作一简要的介绍。

一、徐坊的生平

徐坊，字士言，又字矩庵，号梧生，又号蒿庵^②，室名“归朴堂”，山东临清直隶州（今临清市）人。荫生。曾祖徐学来，官至广东肇庆府知府；祖父徐维清，官至甘肃宁夏府知府；父亲徐延旭，官至广西巡抚。徐坊于同治三年（1864）出生在这个世代为官的家庭里。据说他从小就很聪明，但不事举子业。大约在十八九岁时娶了大学士定兴鹿传霖的第四个女儿为妻。光绪十年（1884），他二十岁的时候，身为广西巡抚的徐延旭，在中法战争中不战而逃，被逮下刑部大狱，判成死罪；多亏左宗棠、李鸿章、丁宝桢等人交章驰救，方得幸免于死。出狱后，奉命戍守新疆；可是，未出都就病死了。大约在这之前，徐坊已把家从临清迁到了潍县。不久，他以父荫被任命为户部江南司主事。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），八国联军攻陷北京，徐坊扈从两宫至西安，明年扈皇上返京。经学部尚书荣文恪的疏荐，由主事超擢国子丞。宣统元年（1909）京师图书馆创设，清学部奏准，派翰林院编修缪荃孙充任该馆监督，国子丞徐坊充任该馆副监督^③。这是北京图书馆最早的正副馆长，缪、徐二位可算得是我国近代图书馆的创始人。由于当时还处于初创阶段，主要的任务只限于收集藏书和进行编目，并没有对外开放。但草创之功，徐坊还是应该记上一笔的。这时他还兼任礼部礼学馆的顾问官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，清帝被迫退位。这件事使徐坊痛心疾首，他立即弃官，俨然以清朝遗老的身份在北京过着隐居生活。不久，陆润庠死了，徐坊被

召为毓清宫行走，代陆成为废帝溥仪的汉文师傅。这时溥仪十岁左右，调皮得很。有一次上课，溥仪看见徐坊的长眉毛感到很好玩，要他过来让他摸摸；在徐坊遵命俯首过来的时候，被溥仪冷不防地拔下了一根；不久，徐坊就死了。太监们很迷信，都说这是因为徐坊的“寿眉”被“万岁爷”揪掉了的缘故^④。其实，徐坊早已患了气管炎（很可能是肺病），这时病情更加剧了，于1916年去世，终年五十三岁。所遗诗文词集若干卷，未刊行。

二、徐坊藏书来龙去脉

徐坊青年时代侨居于收藏旧籍、金石文物风气很盛的潍县，这对他以后的藏书事业可能有较大的影响。清代自嘉道以来，山东潍县出现了不少著名的藏书家和金石收藏家，其中以陈介祺和高鸿裁最有名。当时徐坊与在潍县的学者和藏书家，如孙葆田、柯劭忞、高鸿裁、宋书升诸人交往甚密。还和福山王懿荣、江阴缪荃孙、上虞罗振玉等人结为文字之友。徐坊的许多藏书就是这些朋友替他收集到的。

徐坊的聚书活动开始于他出任户部江南司主事之后。他所藏旧抄本《皇甫持正文集》书衣上有题记二则，一则云：“孙佩南大令得此本于趵突泉上，途适过济，佩南即以见贻，时庚寅四月，士言。”另一则云：“庚寅四月，孙佩南得此书于趵突泉上，途适过历下，因此见贻，良友佳贶，书以识之。惜行篋无汲古本，不获一校异同也。上章摄提皋月朔旦。临清徐坊书于济南西郊旅舍。”^⑤这里提到的孙佩南即孙葆田，字佩南，同治三年（1864）进士。孙葆田出生于藏书世家，其祖父藏书数万卷，到他父亲时，家道中落，死之后还有遗书万余卷。孙葆田于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应山东巡抚张曜之请，主尚志堂讲席。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续修《山东通志》，又延孙氏为总纂。跋中所记“上章摄提皋

月”，即庚寅五月，就是光绪十六年，正是孙葆田出任《山东通志》总纂时所赠书。这时徐坊二十七岁，大约已收藏有一定数量的古籍。徐坊所藏四库馆写本《春秋会义》，书中有邹道沂手跋，云：“自先君见背，贫无以存，常鬻书自给。近急谋一葬地，乃从徐梧生农部假百金，梧君高谊，慨然许诺。顾沂此后奔走四方，将此本藏之书簏，或恐散失，无克负荷先世之传。梧生农部雅善收藏，为海内名家，爰以此书归之；亦藏之名山，传之其人之意。书之以矜梧生农部之善，且志沂之罪。辛卯八月棘人邹道沂书。”^⑥邹道沂，山东聊城人，光绪十四年（1888）举人，民国二年（1912）曾任济宁尹，亦为蠹鱼书痴之流，因举债葬父，即以此书作为答谢礼品送给了徐坊。时在光绪十七年（1891），徐坊二十八岁。从邹道沂的题跋中可以看出，这时的徐坊已经是“雅善收藏，为海内名家”了。又徐坊跋宋监本《荀子》云：“右巾箱本《荀子》，丙申（1896）夏观于京师，反复考之，知为陈氏刻本，惟有讹误，亦希见矣。惜不得睹其全，一校异同也。序目首尾两卷已补抄二十有八叶，其余不知何如耳？惜哉！临清徐坊。”^⑦丙申年为光绪二十二年，徐坊三十四岁。又宋刊本《六臣注文选》，是建本之至精者。书中钤有“徐坊印信”朱文印和“临清徐坊卅四岁后号曰蒿庵”朱文印^⑧。徐坊很少在自己的藏书上钤盖藏印，因此，我们从后一颗藏印可以推测，三十四岁以后可能是徐坊聚书的丰收阶段，因镌刻此印章以示纪念。徐坊在三十四岁前后搜罗到较多的宋元版书和乡先贤手稿，藏书的质量比以前有了较大的提高。1900年后，他当上了学部国子监丞，1909年又被任命为京师图书馆副监督，更可以利用职务之便看见和收集到更多的罕见珍本了。这时他的聚书活动达到了鼎盛阶段。校书、抄书也成了他聚书活动的重要内容。他专门备有印着“归朴堂”字样的抄书纸，见有罕觐珍密之书和先哲手稿即动手抄录。这种工作大约继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。后来他患了重

病，直至去世，就很少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了。令人遗憾的是，他在不很长的一生里，没有系统全面整理过他的藏书，更没有编成藏书目录，他的题跋看到的也不多。现在我们知见他的藏印，除上面提到的“临清徐坊卅四岁后号曰蒿庵”朱文印和“徐坊印信”朱文印之外，还有“徐坊之印”、“国子先生”、“临清徐坊士言藏书印”、“徐坊”白文印共六种而已。

三、徐坊藏书的流散经过

徐坊去世之后，他的藏书由他的夫人鹿氏掌管。这可以从张元济和傅增湘两位先生来往的书札中明显看出来。1930年2月傅先生在给张先生的信中说：“《魏书》徐梧生家有宋本，完全，顷往询。言老太太（案：指徐夫人鹿氏）病重，不能检出。且索价亦殊昂。”至四月，傅先生信中又说：“《魏书》之主现因患病，不能取书，迟早当有报命。闻全部均宋印本，可贵也。”至六月，傅先生信中又说：“徐梧生夫人已故，其《魏书》终须出售，闻确为宋印完整。”至七月，傅先生即将《魏书》买成取回^⑤。可见徐夫人死前仍掌管全部藏书。从1916年至1926年，徐坊死后的十年中，他的全部藏书还保存完好。1926年以后，国家多故，争战不已，鹿氏才决定以高价出售部分藏书。当时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文化遗产大肆掠夺，这种情况引起了国内有识之士的极大关注。张元济先生在徐氏藏书将散之际，他马上给傅增湘先生去信，发起组织古书保存会，倡议集体筹资收购，这件事虽然没能实现，足见他们对徐坊藏书的重视。后来张元济先生几次托傅增湘先生代涵芬楼收购徐氏所藏宋本书。1926年1月，傅先生来到徐宅，观看了部分藏书，遂后将了解到的情况写信告诉张先生。信中说：“今日往徐午（梧）生宅，看得宋本《周易》单疏（大板，十五行。）、《唐文粹》（大版，十五行。）、

《楼攻愧集》（一百二十卷）、《三苏文粹》（小板细字，精极，瞿氏有七十卷，十九行，行廿六字）、《荀子》（袖珍本）、百衲《史记》（宋元合）、中统《史记》、宋本（残）《左传》、《通鉴纲目》（大字）。闻有《文选》、《仪礼》、《韩文举要》（孤本），尚未见。前五种极精，尚未开价。然其人精而滑，恐不易着手也。先此报告，祈密之。”^⑩1927年8月，徐氏藏书开始出售，在出售时，印了一个书目，据傅先生称，是“徐氏全目”，惜未见。我所看到的是张先生摘录的《徐司业遗书目》，共五十七种，这只是张先生希望涵芬楼购藏的书，当然不是徐坊藏书的全部。傅先生在看到《徐氏全目》之前，给张先生的信中说：“徐氏书中善本甚多，抄本及明刊极有佳者。不知此时馆中能收数十种否？如高丽（或日本刊），（案：实际是日本活字刊本）活字本《弘明集》极少见。又宋元集亦有罕觐者，校本亦多名笔，侍只见十之一二耳”^⑪。九月，《徐氏书目》印出，藏书开始出售，傅先生在给张先生的信中又说：“《徐氏全目》昨日邮呈，计可达。但价值奇高，凡校抄者皆百元以上一册，不知何人有此大手笔也。（徐氏书内如《陈古灵集》乾隆后抄本，五册索五百元，他可知矣。）”^⑫1930年，徐夫人鹿氏去世，藏书分别归她的儿子徐钟葳和她的大女婿史宝安。徐钟葳在徐坊去世之后，溥仪曾赐他乾清门三等侍卫官职；史宝安，字吉甫，曾任清翰林院编修，庐氏人。1935年，傅先生又到徐宅，观看了宋监本《周易正义》，“惊为旷世奇宝，”强烈地吸引了他，“时时往来于怀，”终因未能谐价而罢。后来，傅先生又从史宝安处收购了一些徐坊的藏书。大约至1940年前，徐坊一生苦心收集的藏书就“陆续散尽”了。傅先生通过当时的书贾，主要是翰文斋、蟠青书室、文禄堂、文德书坊等陆续看见和收购了不少，并将这些书著录在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、《藏园群书题记》、《双鉴楼善本书目》、《双鉴楼藏书续记》中^⑬。傅先生这几种书目就成了我们研究徐

坊藏书的重要材料。

四、徐坊藏书的特色

根据考查所得，徐坊藏书计经部收书二十四种，史部三十六种，子部二十七种，集部九十八种，丛书三部三百二十二种，时代不明者尚有十八种，共五百二十五种，以集部书数量最多。这些书以今天的标准来看，都可定为善本。刊本中有宋刻本十六种三百四十八卷（有五种尚不知卷数）；元刻本九种二百五十八卷（有一种不知卷数）；宋元合刻本二种，一种为一百一十四卷，一种不知卷数。宋元本共有二十七种七百余卷。还有元明间刊本一种五卷；日本活字本二种三十六卷，三朝版一种；其他明清刊本三十一一种，多为明刊，清刊本极少。徐坊所藏刊本中极多精品。其中最著名的，自然是上面提到的北宋监本《周易正义》。这是国内《周易》单疏的孤本，张元济先生为涵芬楼辑印《四部丛刊》，知道为临清徐氏所藏，但久求未得。1931年，经傅增湘转托廉惠卿与徐氏协商，傅出价五千元，因廉惠卿突然去世，终未成交。后此书易主，1934年展转为傅先生所得，影印百部行世。其次是宋绍兴九年（1139）临安府刊本《文粹》一百卷，为杭本之至精者；宋刊本《六臣注文选》六十卷，字体遒丽，锋棱峭峻，是建本之最精者。这两部书的书影都收入《中国版刻图录》。宋刻本《韩集举正》，字体清劲，刊摹精善，版式阔大，殊便观览。中逢下有一种花鱼尾，其形为，在宋刊中极为罕见；又篇中校正诸字上加●○□己形符号，也是宋本中所仅见的。宋元合刊本《魏书》一百一十四卷，完整无缺，足以补殿本传第四之十和志十四第十二页的阙页，显得更为可贵。还有日本活字本《弘明集》也不失为罕见之本。

徐坊和其他明清藏书家一样，十分重视抄本书的收藏。在他

所藏五百二十五种书中，抄本就有四百一十六种，占他全部藏书的百分之七十九，比重是很大的。其中最著名的是《张说之文集》三十卷，原为朱氏椒花吟舫据家藏宋本传录。旧传朱彝尊家所藏宋刊本三十卷为诸城刘喜海所得，刘之后不知踪迹矣。数百年来，此抄本就成为上自秘府，下至藏书家穷搜渴想而不可得之者。徐坊死后为邢赞亭所得。还有明抄本《孔毅父文集》，此书明代为朱氏横经阁藏，清代入郁氏宜稼堂，郁氏散出展转归徐坊，这些藏书家都秘不示人，故世间罕传。旧抄本《宋真宗御制玉京集》，道藏中未收，亦仅见之秘笈。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六十卷，后集四十卷，明棉纸红格写本，此种书多不全，唯徐坊所藏百卷完整。

徐坊非常注意收藏名家的校本和孤传稿本，特别是山左先贤的手泽。如孔继涵撰《红榈书屋文集》为曲阜孔氏原稿本。宋书升的《夏小正笺疏》，据叶景揆《卷盦书跋》考证，系宋书升借用“归朴堂”抄书纸写的最后定本。此书卷六末页尚有徐坊补抄八字，并注云：“纸已破损，补书于此”^⑭。可见徐氏对山左先哲手泽的爱惜之心。旧写本《洛阳九老祖龙学文集》，书中有李文藻跋。又有明刊本《大戴礼记》为日照许氏校本，护页上有徐坊墨笔题字云：“日照许印林先生批校本，壬子（1852）春，坊记。”还有武英殿本《尔雅注疏》，孔继涵以元本手校，极细；曹寅刊本《集韵》，段玉裁以影宋本校，有手跋；旧写本《元和郡县图志》，有陈鱣校记，黄尧圃、孙星如手跋，等等。

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徐坊收藏了山东重要藏书家李冬涵的不少藏书。我从傅增湘的《双鉴楼藏书续记》卷下《磨墨亭丛书》记中搜集到这一重要资料。傅记云：

《磨墨亭丛书》二百二十二卷，济宁李氏抄本，全书凡六十五种，钤“李氏藏书”、“冬涵阅过”二印，盖缮正以待梓者也。各书行款不一，其八行二十一字者大抵皆传抄阁

本。审其笔迹，似咸同间人所为。其中如《墨史》及《穆参军集》据别本校勘，则近人徐梧生之笔意。当时所录各书，多无刊本，故拟汇为丛刻；今检其目录，则近岁流传者已十居八九矣。乾嘉以后，刻书之风盛行，如孙氏、毕氏、鲍氏、黄氏、卢氏，皆在大江以南；惟北地则声闻寂寞。李氏僻居东鲁而奋然有志于此，搜采数百卷之多，惜各书多不附题跋序例；惟《澹生堂书目》有冬涵手记，题同治壬申（1872）岁。其事迹别无可考，使人把卷流连，有名字翳如之叹，爰详著其目于册，俟异时就彼州人士访求焉。

余昔年得宋刊本《方言》，海内孤帙也。中有“冬涵阅过”朱文方印，昨岁梧生司业藏书散出时，有抄本数十部，亦钤此章。余就其中收其《皇宋策要》二册，意其人亦癖书嗜古之流，萤乾蠹老，遗籍长留，徒令人展卷摩挲，而想象其丰采，斯亦足慰矣。

关于李冬涵的藏书事迹在有关藏书家的专著中未见提及，所以很少为人所知，连傅先生也感到十分惋惜。幸运得很，我在民国《济宁直隶州续志》卷十二中意外地找到了李冬涵传，现全文抄录如下：

李毓恒字冬涵，一字勉斋，幼嗜学，就傅占毕，辄自携《四库书目》潜阅，具知古今学术派别，门径涂轨。因有志存书，购书六七万卷，部分类析，略述梗概，并辑诸家藏书之约，成《惜阴书屋书目》六卷；又仿《郡斋读书志》例，每书抉摘要义，辨正异闻，著《勉斋读书记》，校刊先世遗集。济宁修城，知州王恩培邀使毓恒襄役，始出预闻地方公事。此后积谷，保甲，修圩，修志，靡役不从。又议汉儒何休明议祀乡，当为建祠；故总兵陈国瑞当附祀僧王祠；古南池当附祀许主簿南池之祀；邦人从其论。徐纂州志，哀集已刊未刊乡耆著作四十余家，邦人之考文献者多于是取徵焉。

光绪中叶，乡塾尽易帖括之习，购书诵读风气转移，自毓恒始。卒年六十。子三。长继琨，字瑶林，光绪十年（1884）举人。

从传文中可以看出，李冬涵不但是位藏书家，而且还是目录学家。只因不求仕进，没有功名，而不显于世。他所著的两部目录学专著《惜阴书屋书目》与《勉斋读书记》，在光绪《山东通志·艺文志》里均无著录，也未见其他目录学专著提及，可能早已佚失了。李冬涵大约生活在1831年至1891年之间。李冬涵卒后，藏书散出，徐坊收购不少。除傅先生提到的抄本数十部和《磨墨亭丛书》六十五种外，在王重民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经部小学类中还找到了《重订直音篇》七卷，是明万历间刊本，卷内有“冬涵”印记，北京大学收藏。种种迹象表明，李氏藏书多有传于今世者。我拟另写《李冬涵传》，以记其搜藏山左先贤遗籍之苦心。李氏藏书所以能传于今世，不能不说是徐坊的收藏之功。

徐坊曾经收藏过另一部较大的丛书，那就是震泽杨复吉的《昭代丛书》续编手稿本。包括续编、广编、埤编、新编、别编各五十卷，共收书二百五十种，即一种为一卷。新安张氏《昭代丛书》原已有甲、乙、丙三集，因岁久散佚不完，杨氏乃赓续为此。此书自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）始，至嘉庆二十一年（1816），前后历四十四年，为杨氏毕生精力所聚。此书保存了清代许多遗文佚典，是一部有极高文献价值的丛书。道光时，吴江沈茂德将杨氏丛刻中谐谑香艳诸品析出，附之别集，而取他书补之，以符杨氏每集五十书之例。又将五编易为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，以继张氏之后，合而刊行。后杨氏稿本为徐坊所得，徐坊死后，傅先生从文德书坊购到，一直收藏到解放以后。现在我们还能看到杨氏《昭代丛书》的原貌。

徐坊还收藏了两种重要稿本：一种是清焦循的《毛诗名物解》手稿本；另一种是清李兆洛撰的《辨志书塾文抄》，这是李

申耆《养一斋文集》的稿本。这都是珍贵的先贤手泽。

徐坊除收藏古籍之外，对金石、甲骨文字也颇有兴趣。我在容庚、瞿润缙编的《殷契卜辞》里发现，徐坊收藏的刻字商代甲骨竟有八百七十四片之多。光绪年间，殷墟甲骨被发现之后，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贩卖甲骨的古董商人，其中不少是潍县人，如闻名全国的“潍县估人”就有范维卿（字寿轩）、赵执斋、陈估（名字不详）等人。当时的潍县也就成为全国最大的甲骨市场。范维卿是最早在河南小屯村收买甲骨的人，也是他最早将甲骨贩卖到北京和天津的。1899年（光绪二十五年），王襄第一次从市上出售的从河南安阳运到天津的“龟版”，鉴定为殷商时代的甲骨文，就是从范维卿手里得到的^①。后来，范氏又将大量带字甲骨高价卖给王懿荣，使王氏成为当时最大的甲骨文收藏家。徐坊与王懿荣都是山东同乡，又同在北京为官，两人交往甚密。徐坊从年轻时就对金石文字有浓厚的兴趣，自然很容易受王懿荣的影响。徐坊死后，这批甲骨归于燕京大学，后归北京大学。可以说，徐坊是我国早期的甲骨文收藏家之一。

徐坊的藏书和其他封建社会藏书家的命运一样，身后不久就烟消云散了。这是封建社会造成的必然结果，不是个人的意志所能转移的。使我们特别感到欣慰的是，徐坊多年苦心搜集，为傅增湘先生所经眼的藏书，现在大部分还保存在国内，成为我国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在今天的“四化”建设中继续发挥着作用。

注：

①见傅增湘《藏园群书题记续集》卷一。

②徐坊的字号各书记载不一。柯劭忞撰《墓志铭》云：“字士言，又字梧生” 《清史稿》云：“字士言，号梧生” 民国《临清县志》云：“字梧生” 莫伯骥《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》卷二云：“字士言，又字矩庵，号梧生”。

③见《学部官报》第100期《学部奏准派编修缪荃孙等充图书馆监督各差片》

④见爱新觉罗·溥仪撰《我的前半生》，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。

⑤⑦见王文进《文禄堂访书记》。

⑥⑧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卷三

⑨⑩⑪⑫ 《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牘》，商务印书馆 1986年版。

⑬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；《藏园群书题记》，企麟轩1930年刊本，《双鉴楼藏书续记》，藏园1930年刊本；《双鉴楼善本书目》，藏园1930年刊本。

⑭见叶景揆《卷龠书跋·夏小正笺疏》。

⑮见王襄《簠室题跋》，载1935年3月25日《河北博物院院刊》第85期 《世传王懿荣第一个从中药龙骨中发现甲骨文是误传》。

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六日

作者工作单位：济南山东大学图书馆特藏部

